

■ 考古新知

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的启示

郭大顺

2021年红山文化考古列入“考古中国”国家项目,此后几年,在内蒙古、河北与辽宁诸地同行努力下,不断取得喜人成果,为红山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拓展了新视野。我也在有限的实地考察中,收获三点启示:

牛河梁与“上庙”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北的山台发现后,我们一直寄希望在台上找到一座如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号那样的殿堂一类大型房址。这不仅是因为山台面积较大,南北东西各200米,而且女神庙有朝向北即朝向山台的线索,暗示山台上可能有更为重要的建筑。近几年在山台上的发掘,发现山台可以分出多个单元,女神庙也可包括在山台内,是山台的一部分。特别要提到的是,当年在山台的北部边缘曾发现堆有与女神庙同类但不同类型的诸多仿木建筑构件和人体塑像,其中有约当真人3倍的大耳、上臂和有蜂窝状的建筑构件,显示山台北部有另一座庙宇,与女神庙南北相对,当时分别称为下庙(即女神庙)和上庙。我们也曾寄希望于以后在对第一地点正式发掘时,在山台北部找到上庙的具体位置。近年第一地点发掘虽未找到大房址,也未找到上庙的遗迹和具体位置,但从已发表的简报得知,山台是由多座台基组成的。山台非“台”而为“台基”,台上原应有地上建筑,这是近几年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发掘一个突破性认识。虽然山台上的地上建筑都已无存,但依以往发掘经验,如建筑较高大可能遗有墩墩之类。也由此推断,上庙不是如下庙即女神庙那样的半地穴式,而为地上建筑甚至建在特筑的高台之上。从上庙采集的遗物分析,都外表磨光,质地较硬,仿木建筑构件所饰蜂窝状圆洞的大小与排列较女神庙所出同类建筑构件更为紧密而规整。尤其是约当真人3倍的残耳,不仅个体甚大,而且外表磨光较精,通体呈暗红色,有耳轮的表现,线条清晰流畅,质地、造型都胜于女神庙所出大耳。无论建筑的形式和遗物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龙

的精致度,都在显示上庙规格要远高于下庙。《礼记·王制》等有多庙制的记载和考证。牛河梁遗址不仅有庙,而且不只一座庙,至少为双庙,位于山台北部推定为地上建筑,拥有约当人体3倍的巨型祭祀偶像的上庙,当为主庙,惜已不存,仅存于北墙外的堆积就更显珍贵。

主庙的确认,大大增加了山台的分量,上庙与下庙北南相对,由此向南延伸,为第二地点起三层圆的大型祭坛,形成北庙南坛、北方南圆的南北中轴线,是为牛河梁遗址群的主轴线。这样,从类别与结构,组合与布局,牛河梁遗址都具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要素,也证明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的中心,应即红山古国的都邑。

元宝山与“藏玉于冢”

2024年清理发掘的元宝山积石冢,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南,这里早年曾收集过一件玉雕龙。这次发掘,除在可能为中心大墓的M15发现在头部以上集中放置的三件形体较大的玉雕龙、斜口筒形玉器和玉冠饰以外,大部分玉器是在墓外的冢体堆积内发现的,数量达百件以上。据报道,这些玉器多为经加工的半成品,数量众多的玉钻芯,质量不高的玉料和玉器残件,但也有成型但个体甚小的玉璧环类,如器形规整的圆璧和方璧,玉蚕蛹,甚至有两件小型玉雕龙,以及玉斧钺、玉锥、玉凿。发掘者依据这些玉器出土位置并参照陕西骊城址石砌城墙间所嵌玉斧钺一类玉器,称为“藏玉于墙”。

由此联想到,此前在喀左东山嘴、建平东山岗、朝阳龙城区半拉山和牛河梁积石冢的发掘中,都曾在墓外的冢堆积中发现过一些小型玉器,如东山嘴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鸂形凤,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的玉仿凤、小型的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玉珠等,四号冢的勾云形玉器残件,还有祭坛上的两件玉芯、第五地点的玉珠、玉蚕蛹、双联玉璧等,第十六地点也有小件玉器



北部圆冢(由北向南)



元宝山遗址冢墙下的筒形器近景



牛河梁全景图

■ 学术前沿

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艳菲 王政良

7月17日至20日,“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举办。本次研讨会主题是总结和回顾过去30年国内外聚落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探讨古代聚落与社会研究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韩国、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以及中国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60余家高校、文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环节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王芬教授主持,5位学者围绕中外区域系统调查的最新成果展开分享。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盖瑞·费曼(Gary Feinman)从宏观视角阐述了区域系统调查在重新构建全球历史中的作用。他提出中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结果与简单环境论及线性模式不完全对应,并揭示显著时空差异。这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多样性、合作及主观选择的历史作用,而相关思考已体现在家户及微观研究中。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梁丰实结合鲁东南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数据,揭示出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文化的聚落结构,即“城址—环壕聚落—小型聚落”,与中国古代国家的“都—邑—聚”模式或结构相当吻合,应是早期国家基本形态。同时,调查区域的南北两区在遗址数量及所承载人口规模、不同等级聚落遗址数量及其人口数量分布上呈现出明显区别。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方辉回顾了山东沿海地区30年来区域系统性考古学研究成果,特别强调了历史地理文献对聚落形态阐述的重要性。调查和研究结果初步恢复了沿海地区秦汉社会“全景图”,为考察琅琊郡基层社会行政组织、人口规模与分布、交通路线、郡县乡里组织、秦汉县治地望乃至县界标识等问题提供了文献之外的实证资料。显示了区域系统调查数据对于社会考古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聚落考古研究范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峰(Li Feng)基于对龙口归城的调查和试掘资料,通过研究珍珠门文化在该地区的存在状态、生产系统及其在归城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出归城地区的周文化与珍珠门文化之间存在互补性交流机制,此为两种文化的日渐融合提供了条件。

专题汇报

专题汇报环节由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研究员沈辰(Shen Chen)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荆志淳(Jing Zhichun)主持。中外学者围绕亚洲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考古议题做了12场学术报告。

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德安(Anne Underhill)从城市发展与性质两方面提出山东各区域社会变迁的证据,认为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到商代考古遗存丰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契机。相关议题论著将引发国际考古学界对早期城市研究的广泛关注,推动山东考古成果融入全球学术对话,为早期城市化共性与差异研究提供关键参考。

王芬教授以两城镇和苏家村遗址为例,总结了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在鲁东南地区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及多学科研究新进展。这些成果对于深入研究龙山文化聚落结构,探讨海岱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区域聚落形态结构、人地关系演变及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王子婵和教授李曼(Li Min)认为,史前朝圣活动在中国早期龙山时代的跨区域交换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了人口流动、物资交换及象征体系的标准化进程,培育出共同文化氛围,并支撑了稳定交换廊道的形成,为复杂政体崛起奠定基础。

美国福尔曼大学助理教授吴浩森(Andrew Womack)和以色列海法大学高级讲师哈克(Yitzchak Jaffe),讨论了鲁中、鲁北商周陶鬲的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并结合岩相、微痕及残留物分析,探究了器物制作和流通,及其所反映的商周变革对民众生活、族群认同的影响,社群对商周文化的接受、适应和抗拒。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姚蜂芸(Alice Yao)认为山东沿海聚落调查项目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系统地确定了秦汉空间足迹。这不仅揭示了帝国运动背后的领土政治,还证实了这一时期人口



会议现场

激增的事实。通过与长江地区秦汉时期的聚落模式进行比较,她认为不同地区在城市规模、人口估计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皆有所不同。

美国宝尔博物馆研究员焦天龙(Jiao Tian-long)提出海洋聚落考古为新兴领域,聚落分布受海岸环境尤其是海平面变化影响。中国史前海洋聚落的发展可分为更新世末期、全新世初期、全新世中期三个阶段,地域上分为北、中、南三区,海洋开发形式和航海术发展程度各异。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江雨德(Roderick Campbell)认为郑州南城制骨业专业化程度高,但可能没有大规模作坊。虽存在众多中小作坊,但骨器生产未实现标准化和批量化,且作坊间具有差异。制骨业非中央化亦非王室控制。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永迪(Li Yongdi)探讨了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与布局,系统梳理手工业遗址的种类、生产型态及空间分布,从城市空间构成与社会组织角度,讨论生产运作方式及影响,认为以氏族家族亲属关系为单位解释聚落型态及生产模式存在不足。

英国牛津大学副教授安可(Anke Hein)以薄片分析法研究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双层器,发现其粗陶与细陶部分采用不同陶土及属和料组合,通过多种接合技术降低接缝开裂风险。双层器揭示陶器材质与设计的内关联,这种克服技术难题的粗细陶结合工艺具特殊意义。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博士后李晋沃(Jinok Lee)探讨了韩国青铜时代松菊里式房屋黑色沉积物成因,通过环境考古学方法,结合植硅体分析与土壤微形态学观察,发现沉积层由碳化物质堆积形成,含水稻与粟植硅体。农作物、草及低地土壤曾用作建筑材料,沉积层形成于房屋堆积后经焚烧改变。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内克米·卡鲁尔(Necmi Karul)以土耳其Taş Tepeler项目的

哥贝克力石阵、卡拉汉等遗址为案例,探讨了全新世早期定居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两遗址均有长期居住人口、大型公共建筑、相连建筑群及精致艺术品,有助于从社会 and 定居角度全面分析史前社会的象征性和社会性。

土耳其库罗瓦大学副教授法特玛·沙欣(Fatma ŞAHİN)汇报了尚勒乌尔法地区最新田野调查成果,2021年发现的恰克马克特佩遗址反映了定居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定居遗址和沙漠风筝结构是人类定居及动植物驯化的直接证据,石器打制工艺表明其在前陶新石器时代A阶段(PPNA)便有人居住,地下式及圆形单室房屋等为研究定居化狩猎采集群体生活与社会组织提供线索。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介绍了良渚古城历年考古发现,2007年发现以莫角山为中心的长方形古城,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城墙用黄土堆筑,底部有石头地基和青胶泥,内外有壕沟。城西有贵族墓地,城南粮仓出土20万公斤炭化稻米。2009年发现外郭城,中心宫殿区30万、内城300万、外郭600多万平方米。2010年后发现距今4700—5100年的水坝,水库面积14平方公里,水利系统复杂。

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吴冬明探讨了聚落视角下青铜时代鄂东南社会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传统研究侧重资源与采冶技术,对聚落、社会及人的关注不足,如采矿者身份、聚落规模等问题待解。从聚落视角分析形态变迁及矿产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可透物见人,了解其历史。

4. 经济与社会研究

杜伦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文菲对青邱遗址龙山文化时期房屋的建造与使用进行了地学考古学重建,发现房屋建造材料主要取自近旁河湖沉积和文化堆积,反映就地取材。研究揭示建造工艺、家户活动与空间布局在社会复杂化中的作用,也为家户、聚落考古及社会结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徐波将齐国大型刀币的出土按数量分为五级,附近多分布盐池林等国家管控资源。大型刀币分布反映齐国交通、关隘、城邑及边疆范围,未发现出土于疆域外。大型刀币形态重量稳定,推测为齐国上层有意识创造,属官营经济体系下社会统治复杂化产物。

本次会议讨论内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以全球视野聚焦亚洲地区,研究地域既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也涵盖中亚、南亚及东南亚,时间跨度近万年。研究视角多维化,从宏观视角强调全球比较研究,重点探讨文明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从微观视角展示区域系统调查最新成果,并聚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关键区域;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索聚落形态、手工业生产(如陶器、冶金)等具体问题。凸显了中国考古学在全球文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与国际主流学术话语的深度融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郑家沟1号积石冢地形地貌(北—南)



郑家沟1号积石冢三联璧

说黄帝族活动及黄帝族与炎帝、蚩尤族接触交流的地区。文献也多记黄帝族的一些北方游牧和渔猎文化特点,如“往来迁徙无常处”(《史记·五帝本纪》)等,郑家沟等分布区域广阔、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积石冢群的发现,为揭示古史传说的黄帝传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线索。正如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文明起源讨论刚开始时所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此后的1993年,他在与赤峰史学工作者谈话时更明确表达了处于五帝时代前期的红山文化极可能与黄帝族有关,他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从辽河流域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坛庙冢”到宣化郑家沟等大规模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发现,正在印证着苏先生的预见。

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解开或正在解开我脑海中的一些谜团,所以,要向工作在红山文化考古第一线的诸位致敬。

(本文系作者在首届红山文化国际传播大会暨“新时代大讲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